

“行万里路”式的科学博物馆图志

□ 赵洋

博物馆是征集、保藏、陈列和研究代表自然和人类发展的实物，并为公众提供知识、教育和审美体验的文化教育机构。科学工业博物馆是博物馆的重要门类之一。《吴国盛科学博物馆图志》丛书（以下简称“丛书”）的作者吴国盛教授认为，广义的科学博物馆包括自然博物馆、科学工业博物馆和科学中心三种类型，狭义的科学博物馆指其中的科学工业博物馆。

由于科技文物和工业遗产中蕴含着丰富的历史信息、科技原理，凝结着科学精神与科学思想，堪称是进行科学普及、科技史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的“活教材”，科技进步、工业发达的国家普遍重视科学工业博物馆的建设，科学博物馆也成为现代性的生成与维系场所。

本丛书共7册，以图文并茂的形式记录了作者在英国、欧洲、澳大利亚、美国等地的多个科学博物馆和科学中心的游踪。上述国家和地区不但是科学博物馆和科学中心的发源地，更是科学革命、工业革命的发源地。如波士顿科学博物馆的历史可以上溯至创立于1830年的波士顿自然志学会，陈列品包括矿石、生物标本、航天器及医学、电学等学科的实物。伦敦科学博物馆的前身建于1857年，保存并陈列在科技史上具有

意义，并对现代科技研究和探索也具参考价值。芝加哥科学工业博物馆建于1926年，借鉴了德意志博物馆的组织机构与管理方式，有21个展厅，藏品3.5万件。1929年在佛罗伦萨开放的科学史博物馆展出了许多反映自古以来科学进展情况的珍贵文物，如伽利略发现木星卫星的望远镜、爱迪生制造的最早的圆柱体留声机等。

书中内容最早在作者的博客上连载，成书时经过了精心编辑与排版，系统性更强，不但是一套科学博物馆图志，也是记录世界各地的重要科技文物和经典互动展品的图集。

作者在以互动展品见长的科学中心拍摄了大量展品照片，有些照片看似内容近似，但至少说明了两个问题：一、这些表现相同科学原理的展品，往往采用了不同的表现方式，可供业内人士分析其设计思路。二、这反映了科学中心擅长表现物理学、机械等学科，不擅长表现数学、化学、生物等学科的现实，这是科学中心“众馆一面”现象的根源。

反观以陈列科技遗产为主的科学博物馆：有的博物馆中，古旧的机器仍然能够运行，在古董旁边，说明性的互动展品可以帮助观众理解先驱者们天才构思（伯明翰科

学博物馆）。有的博物馆贯彻着把科技遗产与社会历史背景密切结合的综合布展理念（伦敦科学博物馆）。还有博物馆将科学与艺术相结合，绽放出独特光彩（MIT博物馆）。可以说，这样的科学博物馆是各具特色，少有雷同。有感于此，作者在书中发出这样的慨叹：“全世界的科学中心的互动展品都差不多，而博物馆却各有各的珍藏。”看来，未来的科学中心要注重把历史、社会、人文的因素引入布展理念、展厅环境和互动展品之中，方能保持不竭的魅力。



吴国盛科学博物馆图志（套装7册），吴国盛著，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2017年3月第1版。

应补上科学工业博物馆这一课

目前，科学博物馆在中国大陆的博物馆版图上还是空白。建设创新型国家，首先要以史为鉴，研究历史上科技创新的成败经验。近代科学引入中国以来，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华儿女做出了大量科技创新与技术发明。与此同时，国内留存的许多珍贵的科技文物与工业遗产因得不到重视和有效保护，正处于濒临散失和消亡的境地。

通过“行万里路”式的实地考察，吴国盛教授对比分析了海外科学博物馆的发展历程与现状，认为近年来中国的科学博物馆事业过于偏重于科学中心的发展，缺失了科学工业博物馆这一类型。应补上这一课。

吴国盛教授认为，虽然中国不是近代科学的故乡，尚缺乏科学、技术和工业系统的历史收藏，但通过精密复制科技文物，仍然可以在中国的博物馆中再现科学的历程。这些复制工作本身也是科技史研究和科技遗产保护工作的一部分。

从这个意义讲，不仅是科技爱好者和博物馆爱好者，科技类博物馆从业者和科技史研究者也能从此丛书中得到收获。

《爱这个世界》：走近阿伦特

汉娜·阿伦特是20世纪伟大而具原创性的思想家、政治哲学家和社会理论家。《爱这个世界：汉娜·阿伦特传》是西方学界最早、最权威的一部阿伦特传记性著作。本书将历史事件、人生经历与传主思想和著作的介绍紧密结合。对于不了解阿伦特的读者来说，本书是一个全面生动的引介；对于阿伦特的粉丝而言，更是不可错过的阅读盛宴。

阿伦特的这本传记通过对阿伦特“朋友圈”的介绍：老师兼情人海德格尔、导师雅斯贝尔斯、前夫君特·斯特恩、丈夫布吕赫、朋友玛丽·麦卡锡、W.H.奥登，展现出20世纪智识生活的全貌。阅读这本书，你会了解阿伦特珍惜友情的真实故事。

这本传记分四个部分共十章。第一部分讲述阿伦特的童年、少年、大学以及大学后参与德国犹太人的保护工作的经历；第二部分讲述她流亡法国，逐步融入美国并在美国开始崭露头角的历程；第三部分讲述阿伦特的学术研究生活，1961年以后因《耶路撒冷的艾希曼》而卷入漩涡的历史事件；第四部分讲述1965—1970年间黑暗时代的美国，阿伦特参与反对越南战争以及她的最后岁月。

《深圳晚报》文/刘莉

《去旅行》：呈现多彩世界

《去旅行》，（法）阿梅莉·卡斯唐等著，卡米耶·拉杜斯等绘，焦旸译，广西科学技术出版社2017年5月出版。

要么旅行，要么读书，总有一个在路上。这是我们的梦想，也是对孩子们的希望。《去旅行》就是一本让孩子可以带在旅行路上的百科全书，涉及六个国家地理、历史、政治、体育、娱乐、美食等知识。书中用百余张手绘和实景图，展现了英国、美国、德国、意大利、西班牙、日本等六国的日常生活和方方面面，让孩子们轻轻松松了解各国文化特色。每个国家都有两个当地小朋友，对自己一天的生活做详细介绍，在学校上什么课、吃什么、玩什么，相当于带领大家一同参观游览，切身感受当地的语言和习俗。

作者和绘者团队都是法国人，分别是著名儿童畅销书作家和法国百年儿童出版社专用画家。他们其中不乏本身就是旅居海外的创作者，所以对不同国家有更加细致入微的描摹和观察。从《哈利·波特》到日本动漫，从校园生活到体育明星，从三明治命名的由来到生吃和熟吃鱼的分别，他们选取孩子感兴趣的话题，用孩子的语言叙述，试图呈现一个多彩缤纷的世界。

《新京报》



5月底，第四届中国出版政府奖评奖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在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官网公示入选获奖名单，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的《竺可桢全集》喜获图书奖。

专注于打造科普精品才是硬道理

谈起《竺可桢全集》所获殊荣，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总编辑王世平说，这是科教社长期“专注于打造科普精品”的结果。

多年来，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对科普出版有着自己的执着和坚守。从之前的翁经义社长、张英光社长，到现任的张莉琴社长，都十分重视科普出版。早在翁经义任社长时，他就提出“愿做科教兴国马前卒”，这成为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珍视且不断发扬光大的企业文化。王世平说，正是在这样一种企业文化的大基调下，科教社的科普情怀和社会责任感在几任社长身上一脉相承。

谈到《竺可桢全集》14年的出版历程，王世平有许多感慨。早在20世纪70年代，中国科学院就决定编辑《竺可桢文集》，此书于1979年3月由科学出版社出版，只有约70万字。为了全面反映竺可桢的学术成就和人文精神，2000年3月，在纪念竺可桢诞辰110周年前后，十多位院

士提议增补《竺可桢文集》，得到中国科学院的支持。在一年的资料收集整理过程中，大家深感有出版全集之必要，但苦于出版资金无法落实。2000年11月，时任科教社社长的翁经义在了解到这些信息和编纂组的困难后，果断决定在无任何出版资助的情况下将《全集》作为科教社的重大出版项目。在2014年4月28日举办的《全集》收官研讨会上，主编樊洪业提起此细节还难掩激动之情。经过14载艰苦努力，24卷终于全部完成。

《全集》的编纂遵循两大宗旨：一是求全。凡能找到的竺可桢的文字资料尽量收入。二是存真，力求如实展现竺可桢的人生道路和社会文化变迁的历史进程，为后世提供具有独特价值的珍贵史料。《全集》所收文献纵亘1916—1974年，计59年，历经中国现代史之各个重要发展阶段，不仅所记述史实弥足珍贵，其文章写作样式、编辑出版规

范、社会流行语言、术语译名演变，等等，也都真实地反映着不同时代的文化样态和流变趋势，具有特殊的史料价值。

《全集》所含文献历史跨度长，涉及人物多，内容极其丰富，需要编辑不断与时俱进，根据每一卷的实际情况调整编辑细则。比如，《全集》中占比很大的竺可桢日记，在竺可桢生前从未示人，在很大程度上属于私人史料性质的文字，加上竺可桢的知识面非常广博，日记的内容涉及各个领域，且经历了38年的历史变迁，不同时代人们使用的语言文字的变化在日记中均有明显的体现，从科学的符号、公式和概念用语，到日常生活所用的名词、称谓等，都在随着时代的变迁而不断变化，对这些，便需要编辑用心甄别，不能轻易按现行的标准作编辑加工。总的来说，《全集》编辑出版的过程，也是编辑不断学习、不断积累的过程。百道网2017.6.23

在原创大型项目磨砺中快速成长

个品种，皆为科学人文类上乘佳作。王世平1999年进入科教社就参与“哲人石”项目。她回忆说：“当时我跟着卞毓麟和潘涛两位老师做‘哲人石’，他们对编辑的要求很严格，而事实证明有要求才能有提升。一本本‘哲人石’做下来，我对科普精品有了清晰的定位。做‘哲人石’的很多经验对我们后来加强原创科普出版提供了很大的帮助。”

对于年轻编辑来说，如何沉下

心做高品质图书是一件非常考验人的事。王世平举了科普编辑室主任殷晓岚的例子。殷晓岚是科学史专业的博士，到出版社之后一直在跟进《竺可桢全集》项目。《全集》从启动到全部完成花了14年，而殷晓岚跟进了其中的后9年。“能一路做到《竺可桢全集》项目收官，编辑的工作态度、看待出版的眼光都变得与众不同。如今小殷已经成为科普编辑室的主任，也是社里非常重要的骨干力量。”